序論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或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

漢娜鄂蘭，《黑暗時代的人們》

壹、研究動機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二十世紀重要的女哲學家，於 1906 年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家庭，她親身見證了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的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人類大規模的傷亡，以及世界政治強權版圖的變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之間，在德國由希特勒領導、納粹專政形成的極權主義政權，是整個西方歷史中前所未見的統治形式，它無法被過去的君主、專制等等政體區分歸類，甚至也超乎過去的政治思想傳統或道德判斷的理解，極權主義宣稱自己找到並遵守歷史運行的法則，運動的目的凌駕於一切，爲此所有的禁制、鎮壓、甚至屠殺等等倒行逆施、危害人權的行爲都被曲解成合乎歷史理性的行動。它對於身處其統治底下的人民表現出高度的掌控和強制，以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等高壓的、非人性對待的恐怖手法達成全面統治的目的。因为從前從未出現過類似的统治手法，所以大部分人面對這個新出現的政體大多不知如何理解與分析。親身經歷極權主義運動的鄂蘭非常關心極權主義問題，進行了描述和研究分析，並於 1951 年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Totalitarianism*），這本書引起了熱烈的迴響以及討論，並確定了以「極權主義」爲討論納粹統治的專有名詞，由此也奠定了鄂蘭在西方政治思想家中的地位。

一般論者將鄂蘭的理論書寫區分爲三期，早期大約是從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開始到 1950 年代出版的《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1960 年代她相繼出版的《論革命》（*On Revolution*）、《在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等書則是屬於中期思考的範疇，晚期的《心智生命》（*The Life of Mind*）、

《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她則重回哲學領域。

終其一生的書寫，鄂蘭都在探究不同層面的政治問題。從早期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探討納粹統治的來源和特性，到《人的境況》中對於良好政治生活必備的公共空間條件，以及對於「寬恕」、「承諾」等等人類能力的界定；《論革命》中對於政治自由以及對憲政主義革命理論的闡述，到後期的《責任與判斷》中對於判斷理論的闡釋，儘管切入的角度有所差異，但基本上鄂蘭的共同關懷都在於如何正確地「理解」（understanding）人類生活的共同世界，而擁有共同意識（common sense）並在人類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中正確地行動。

在鄂蘭過世之後的三十餘年間，鄂蘭的重要性不減反增，學術界中對於鄂蘭政治理論的討論亦趨蓬勃。2002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公布了鄂蘭名爲「馬克斯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Marx and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的一系列手稿；2007 年 *Social Research* 甚至以專刊登載鄂蘭的手稿資料以及相關論者的詮釋，顯見鄂蘭在當代政治理論研究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然而，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在鄂蘭在 1961 年出版的《論革命》，她從革命理論著作的角度加以寫作，從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歷史書寫出發，詳盡地討論了關於這兩個近代重要的革命事例。但是，《論革命》卻與鄂蘭的其他寫作形成相當不同的寫作風貌，它除了對於革命歷史的多所陳述以外，還呈現出對於政治理論的實踐企圖；事實上，鄂蘭寫作《論革命》並非偶然，而是接續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末尾的反思而來；在《論革命》中鄂蘭也表述了她對於政治哲學傳統的相關批評，並且鋪陳她自身對於實踐政治理論的相關思考。本論文企圖指出鄂蘭寫作《論革命》的背景原因及其論旨形成來由，並且結構性地重組書中所表現的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筆者將嘗試指出《論革命》在鄂蘭的寫作生涯中所佔據的理論地位，以及其理論所企圖回應的政治思想問題，這些問題往往被歷來論者忽略；筆者認爲唯有重新梳理《論革命》的理論脈絡，並審視其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定位，才能夠徹底瞭解鄂蘭寫作本書的目的及貢獻。

貳、問題意識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代表性的著作，但是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本身並非她的終極關懷。鄂蘭最關心是人類如何理解、描述並解決極權主義及其背後所暴露出來的問題。

寫完《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的幾年中，鄂蘭開始系統性地在回顧並批判西方傳統政治思想。在 1954 年的文章’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中，鄂蘭的思考已經從對極權主義政體的考察進展到對於現代世界的「理解」（understanding），雖然「有別於正確的資訊或科學知識，理解是一個不能保證明確結果的複雜過程」（Arendt,1994：307），但是理解是必要的，就是因爲現代政治世界對於極權主義的本質缺乏知識（knowledge）以及理解，所以面對這個政治情勢，現代人分外顯得毫無招架之力。所以鄂蘭之後的書寫，都在朝向理解極權政體及現代世界中的政治問題做努力，「反思極權主義是她自我理解的要求。在她看來，思想家的任務不是編織理念，而是一個紮實的工作：去理解，即把握事件的意義。她說，不去理解所發生的事情，我就無法活著。對她而言，只有理解了 20 世紀所發生的這些無法理解的事件，與人類的歷史和解，才能在戰後重新找到『在家的感覺』」（王寅麗，2008，頁 11）。在’On the Nature of Totalitarianism：An Essay in Understanding’一文中，鄂蘭已經開始思索運用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所提及的政體分類來解決對於極權主義本質的理解問題（Arendt,1994：328-338），這一個被孟德斯鳩所啓發的政體分類理論以及對於政體本質及原則的理解，在往後的《論革命》寫作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1953 年，她獲邀到普林斯頓大學進行講學，講座的名稱爲「馬克斯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她開始系統性地對馬克斯主義進行反思，檢視並批判馬克斯主義當中所蘊含的極權主義思想素材。這一系列講座的珍貴手稿在 2002 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加以公布，成爲可供自由下載的研究資料，一般稱爲「高斯手稿」（Gauss Seminar）。以高斯手稿作

爲一個切入點，可以觀察鄂蘭在 50 年代中期的思考和寫作重點，

從高斯手稿中可以看出，鄂蘭在思索馬克斯理論中的問題時，已經提出馬克斯對於西方政治理論傳統看似翻轉實則繼承的特徵（鄂蘭，2007，頁 50）[1]，這是鄂蘭第一次留意到「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在思索現代政治問題時所應扮演的角色。鄂蘭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問題——特別是勞動問題——的思索，後來呈現在 1958 年出版的《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

除了馬克斯的繼承之外，在高斯手稿中，鄂蘭對於傳統的另一個面向的評論著眼於對西方形上學傳統的批判。在手稿中她對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最有名的「洞穴之喻」（Allegory of Cave）做了詳細的詮釋[2]（鄂蘭，2007，頁 103-109）；由對於洞穴之喻的詮釋爲起始，鄂蘭其後的篇章亦不斷嘗試指出西方政治哲學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政治與哲學的對立，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政治事務不斷地受到貶抑和忽略，歸根就柢，其衝突的根源自西方哲學的開頭即已存在。

檢視西方政治理論傳統時，鄂蘭最爲讚揚的是羅馬政治。在高斯手稿中，透過她在探討「法與權力」（鄂蘭，2007，頁 53-68）等等概念時，她時常取徑於羅馬思想傳統，在 1963 年出版的《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論及理想革命以及政體建制的相關想法時，她都回頭溯及羅馬哲學傳統。對於鄂蘭來說，理想的革命及其建制政體的途徑並非法國大革命式的人民主權思想，而是如同美國革命一樣是漸進式的、不運用暴力的革命進程，以及用良好憲政制度建立起來的政治運作基礎。根據鄂蘭的說法，美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爲美國國父們真正認識到了良好政治運作的基礎，而這一想法早在羅馬共和的運行中就被顯現出來，也就是「權威」（Authority）在政體運作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論革命》中另一個使政治體制運作成功的要素是「權力」（Power），這一要素在美國革命過程中的呈現則在於新大陸十三州的人民的自治經驗中。

---

[1] 本文書係鄂蘭在 1953 年的 Gauss Seminar 的中譯本，中文譯爲《馬克斯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孫傳劍譯，已於 2007 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發行，由於 Gauss Seminar 原文無頁數及閱讀上的困難，筆者在本論文中的引文皆採用中文譯本。

[2] 鄂蘭對於柏拉圖的洞穴之喻的詮釋，深受其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在本論文的第一章第二節作者將會作一闡釋。

雖然對於鄂蘭政治理論的詮釋爲數甚多，但是針對鄂蘭在《論革命》一書中對於美國革命的歷史敘事手法和權力、權威的討論卻相對缺乏；其實仔細閱讀《論革命》，可以發現在本書中蘊含了鄂蘭豐沛的政治思考，她在《論革命》中批評法國大革命以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傳統、並頌揚美國革命，藉此成功地塑造美國成爲一個共和政治典範，並藉以對抗自由主義式的理論。她透過對於權力和權威理論的鋪陳，重新定義近代歷史中的革命概念和政體開端理論，在《論革命》中她企圖指出理想革命應該是**賦予人民政治自由的革命**，並且透過人民自身對於政治共同體的珍視維護著公共空間。所以她在給革命下一定義時說：「只有發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並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起碼目標，那才稱得上是革命」（Arendt,1990：35）。

綜觀其寫作生涯，可以發現鄂蘭試圖關懷整個人類文明所遭遇到的問題，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出現了與西方文明傳統的斷裂，許多原先被視爲理所當然的價值已然消逝，但新的判準尚未建立。鄂蘭認爲，彼時的人類正站在過去和未來的交界點，正是時候好好思考，人類究竟遺失了什麼珍貴的思想遺產，並重新估量自身所處之世界以及如何尋找恰當的面對共同世界的方法，正如同她引用海德格（Martin Heidigger）對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評論一般，也許她也期許自己能夠達成「一種對傳統的傾聽，這一傳統並未完全消逝於過去，而是同時思考著當前」（Arendt，2006，頁 189），而《論革命》也正是她給予世界的答案之一。

設身處地想像一下鄂蘭當時面對的政治局勢，不難理解鄂蘭爲什麼會是一位相當關心政治現況的思想家，當時的世界局勢的確異常艱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緊接著全世界面臨著東西兩方陣營敵對的冷戰局勢中，在核武競賽威脅的緊張氣氛下，二十世紀前半看起來簡直就像一場政治災難片。生存其中的鄂蘭希望藉由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及理解，能夠更好地呼應政治問題。依麗莎白•揚—

布魯爾曾經分析她的研究方法指出：「她辯析不同的特點，然後再努力將觀念提煉成清晰的概念，她以『極權主義』作爲開端，爲她探索的每一個概念尋找歷史含義和當下的適用性……把政治話語中人們熟悉的、已經概念化的部分與新的、剛剛可以被概念化從而可以被討論的部分分離開」（Young-Bruehl, 2006：61），因此，綜觀鄂蘭的政治哲學寫作生涯，諸如《論革命》這般看似歷史書寫的作品，其實都包含了她深思熟慮之後的理論鋪陳。因爲對鄂蘭而言，政治分析的首要目標並非單純地提取政治教訓，而是「在於能夠確定什麼是新的東西，從而要求人們能夠做出新的創造性回應」（ibid：61）。

本論文的寫作目的，即在於耙梳鄂蘭從早期在手稿中形成的對於權力和權威及政治哲學傳統的相關論點，連接到其中期《論革命》中的理論思考，企圖呈現歷來較少受到鄂蘭讀者關注的面向。反觀現代政治中呈現的問題，鄂蘭認爲癥結在於對於政治的錯誤理解及想像的匱乏，而唯有透過重新梳理古典政治傳統的資源加以去蕪存菁，並融合於現代政治世界，才能對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個較爲完善的回答。透過對《論革命》的重新耙梳和理解，我們也在鄂蘭的政治書寫中檢視和借鏡哲學傳統的珍貴資源。

參、文獻檢閱

在文獻的部分， 筆者分爲兩個面向加以探討，第一個面向針對鄂蘭的傳統政治哲學批判部分。不論是在前期的高斯手稿或是《人的境況》、《論革命》等書中，鄂蘭都曾經論及從柏拉圖起始至黑格爾、馬克斯一脈相承的西方傳統，許多論者也相繼注意到這點。鄂蘭的柏拉圖詮釋受到其師海德格的影響，她在手稿中所提出洞穴之喻的三個比喻轉折以及詮釋，與海德格在〈柏拉圖的真理學說（收錄於 *Pathmarks*[3]一書中）之論點若合符節，Miguel Abensour 與 Dana Villa（Villa, 1996）都曾經論及海德格對於鄂蘭的影響。Dana Villa 曾以專書 *Arendt and*

[3] Heidegger, Martin. 1998. *Pathmar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t, William McNeill. 中文譯本《路標》，1998，台北：時報，海德格著，孫周興譯。

Heidegger：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來系統性地介紹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 BC–322 BC）、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以及海德格對於鄂蘭在政治思想上的影響，並指出海德格在神學及存在主義層面影響了鄂蘭的行動理論。Abensour 更集中注意在對於洞穴之喻的詮釋上鄂蘭受到的海德格的影響（Abensour, 2007）。Martin Jay 曾經針對鄂蘭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提出批評，認爲鄂蘭的詮釋中完全忽略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補強，而將馬克思主義定位爲經濟決定論（Jay, 1986）；而 Simona Forti 則曾以”The Guilt of the Tradition 爲名，詳細地重新組合鄂蘭在分散的篇章中所曾提及對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馬克思的勞動理論的詮釋（Forti, 1994）。

第二個面向則針對《論革命》，對於其中的政治理論要素，歷來已有學者做過相關討論。Albrecht Wellmer（2000）和 Etienne Tassin（2007）曾對鄂蘭的革命概念及其中的矛盾處做過討論，Tassin 並指出鄂蘭的革命理論中對於開端啓新和維護政體穩定運作兩種需求中存在的矛盾；在鄂蘭的權力理論部分，Habermas 曾就鄂蘭的權力概念做過討論，並取之與 Max Weber、Talcott Parsons 的權力觀念作爲對照（Habermas,1977）。Bonnie Honig 對照鄂蘭與德希達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詮釋，對於鄂蘭《論革命》中的政治理論有全面性的討論，Honig 更有系統地討論了鄂蘭在以美國革命爲範例的書寫過程中挹注的若干理論要素，諸如：鄂蘭以「承諾」做爲政治社群的前提，並且將政治正當性所必須具備的權威要素內化於政治社群本身的力量之中，以避免絕對性權威的問題，接著再藉德希達對於〈獨立宣言〉草稿的閱讀來反思鄂蘭的權力理論（Honig, 2001）。而針對鄂蘭的權威理論，則有 Dean Hammer 注意到《論革命》中鄂蘭對於羅馬政治的詮釋，他以 Virgil 的詩歌、Livy 的歷史學以及 Cicero 的哲學三個面向來探討鄂蘭對於羅馬政治的理解（Hammer, 2002）。Jeremy Waldron 則以憲政政治爲主軸探討其政治理論，結合《人的境況》中的中介（in-between）空間與「承諾」的概念與《論革命》中的「創建」理論，串連解析鄂蘭理論體系中的

憲政要素，探討其理論中的憲政主義可能性（Waldron, 2000）。但是這些論者都並未從一全面性的視角來加以理解及詮釋鄂蘭在《論革命》中的政治理論。

至於討論鄂蘭最全面性的二手詮釋專書，則非 Margarete Canovan 的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Canovan, 1992）莫屬。在本書中 Canovan 相當系統地介紹從《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到《論革命》乃至後期的《責任與判斷》一系列著作後，她認爲鄂蘭的政治哲學思辨中的核心問題是對於極權主義的反省，以及如何在後極權時代重新找到看待政治生活的方式。在 Canovan 的這本書中，加入了對於鄂蘭在 1950 年代前期手稿的閱讀和詮釋，這使得對於鄂蘭的觀察得以獲得更全面的視角。Canovan 總結鄂蘭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於理想政治情境的想像，重新定義鄂蘭的政治理論，並以「新共和主義」（A New Republicanism）（Canovan,1992：201-252）一詞來指稱鄂蘭在《論革命》中的思考，Canovan 所言鄂蘭的「新共和主義」，指稱其思考中具備了多元性、權力、同意、公民權，以及維持共和穩定長久的權威、政治自由等要素，使得公民能夠親身參與實踐真正平等並具多元性的政治經驗，筆者認爲「新共和主義」是對於《論革命》理論體系的良好詮釋，恰當地說明了其中的理論要素特質並定位其於政治思想史的位置，Canovan 對於這些理論要素的發掘和重構是本論文的參考重點。

然而，筆者認爲，上述論者都未曾直接就《論革命》的政治思想作一全面並完整的耙梳及重構，《論革命》一書指在透過革命歷史的鋪陳，說明一個與開端原則相連的革命理論及政體本質論。這番思考主要來自於鄂蘭所指陳的現代世界對於政治理解的需求，現代政治世界的首要特徵就是「共同意識的失落」（1994：314），極權主義是現代世界中傳統的理解喪失後最極端的表現形式，它的出現正好暴露了現代性的問題，所以，要理解及回應極權主義，就等於是要理解在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中所喪失的政治要素，並且將之整併重組。

肆、論文架構

本文的研究旨趣是耙梳鄂蘭在《論革命》中所表現的政治理論，並重新理解從寫完《極權主義的起源》到出版《論革命》的十年間鄂蘭思索的問題，並指出兩著之間的關連。因爲這樣的寫作企圖，所以本書第一章「極權主義之後」將由《極權主義的起源》談起，整理鄂蘭對此政治形式的看法，由此延伸至高斯手稿和其他著作中鄂蘭所提過的對於政治哲學傳統的相關批判，這些批判總結地在法國大革命中顯現出來，在第一章第三節筆者將集中地加以論述。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論文主要部分，主要以革命問題爲主軸進行論述，筆者將嘗試重新整理《論革命》中的權力和權威理論。筆者將說明以美國革命作爲歷史事例著作中，鄂蘭如何鋪陳這兩個共和主義要素。在第二章的權力理論中，主要要說明的是鄂蘭自身特別的權力概念，並且其權力概念如何被導引至對於美國革命的詮釋之中。她的權力概念意指透過人民的集結所產生的力量，在《論革命》中被作爲克服制憲權理論的方案在美國革命中發揮作用。第三章論述的則是在憲政體制落成並開始運行之後發揮效力的權威要素。權威要素意旨對於政體開端的記憶及崇敬，在政體運行的過程當中能夠發揮穩定的功能。

在第四章中，筆者將依循 Canovan 對於鄂蘭的「新共和主義」立場的基本論點，指出鄂蘭有意識地藉助傳統思想資源並整合現代的憲政主義思考，形構出具有現代特性的共和主義政治理論。

筆者希望在 Canovan 的新共和主義理論要素架構上，回溯地建構鄂蘭與一系列西方傳統中重要的哲學家間的對話激盪。藉由梳理鄂蘭對於柏拉圖所代表的西方形上學開端的批判，以及檢視手稿資料中對於馬克思和黑格爾等哲學主流傳統的反思，來理解鄂蘭對於哲學傳統的態度；另一方面，經由重新詮釋《論革命》，筆者也希望能夠提供其政治實踐上的架構方法。經由這兩個面向的詮釋，本論文希望能夠呈現不同於以往的鄂蘭理論面貌，並提供身處後極權時代的人們理解世界的思考資源。